

周振甫編

嚴復思想述評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發行

嚴復思想述評 (全一冊)



實價國幣一元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周振甫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上海澳門路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自序

梁任公先生說：「西洋留學生與本國思想界發生關係者嚴復其首也。」^{〔一〕}蔡子民先生也說：「五十年來（指同治十一年西曆一八七二年以後的五十年）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復爲第一。」^{〔二〕}嚴幾道先生的翻譯工作，不但把他所專門的戰術、砲臺、建築等學掩沒了，也把他自己的學術思想掩沒了。就哲學講，他不但是介紹西方以經驗做基礎的實證論，並且把實證論所認爲不可知的神學的部份加以解決了。他不但介紹西方的演化論，並且對赫胥黎的物競天擇說加以合理的補充，又融會赫胥黎斯賓塞二家的議論而各採其所長。^{〔三〕}像這種修正補充是不是合於真理，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卽此可知他並不是僅僅做介紹思想工作而自己沒有思想的人。

至於講到中國近百年來的思想，那末不但嚴先生是第一個動搖中國的舊思想，介紹西方的新思想的人，並且也是中西文化批判的前驅者。他對於中西文化的得失都能够講出一個所以然來。他對於中國的一切：不論是政治的、經濟的、學術的、宗教的都有獨

特的見解。他對於中國的救亡圖強都有具體的方案。所以就近百年來中國的思想界來看，他不但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並且也是一位劃時代的人物。在他以前，中國人祇知道「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四〕}所以張之洞一班人要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了。自從他介紹西洋學術思想和發表論文以後，於是人們才知道西洋不但政治制度不遜於我國，就是我國所自矜的精神文明比起西洋來也並不能够相勝。他大聲疾呼地打破中西體用論：「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爲體，以馬爲用者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五〕}這是多麼有力量的話呀！當時的一班維新黨雖主張變法，但還不敢否定中國的文化。祇有他勇敢地認西洋的一切勝於中國，主張中國的一切非改從西洋不可的全盤西化論。

我們看中國自清末到民國以來的思想界的遷流和社會的轉變，有許多地方都和嚴先生思想的變動相合。不過嚴先生總是跑前了幾步，這是使人回想起來感到很可痛心。現在試舉犖犖大端來說：

在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嚴先生已在報章上發表文章，介紹西方文化。他

認西方文化的本根祇是「於學術則黜僞而崇真，於刑政則屈私以爲公而已」於是他一方面努力介紹科學方法——邏輯，一方面提倡民主立憲的民治主義。但這些似乎除了少數人以外，得不到大多數人的擁護。一直要到了民國八年陳獨秀胡適之兩位先生起來提倡新文化運動，再請出塞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治）時，才被人家熱烈的歡迎。同樣，像中西文化的批判，全盤西化的論調，嚴先生早已在光緒二十一年以後逐漸提出，但一定要到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時才被普遍地接受。

到了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庚子事變以後，他看到中國國民程度的不適於共和，中國文化的不應當完全否定，於是他不再主張民主立憲了。但這種議論更不爲人所注意。一直到了民國以後，政治上弄得紊亂極了，於是乎有梁漱溟先生在村治上發表中國民族精神不合於西洋政治制度的議論。梁先生認爲中國民族的「知足」「不爭」不適於民主，西方人對於選舉的狂熱，又和中國民族精神不合。這些話嚴先生都早已說過了。不過嚴先生認爲民治雖不適宜於中國，但中國可以漸漸走到民治的路上去。先訓練好民衆自治的能力，再來實行民治。對於中國的舊文化他主張加以批判的接受。

這些都和民國十六年北伐以後國民黨所標榜的政策完全一樣。

到了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二年，他一方面主張保持中國的文化，一方面主張接受西方的文化，不過這兩者都要以適宜於當前的中國爲限度。他說：

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別擇其故所善者保而存之。方其洵洵，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創垂，累葉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獨別擇之功，非矚矚固習者之所能任耳。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

到了民國二十四年才有同樣見解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發表出來。王拭張蔭麟兩位先生的嚴幾道裏說：

這簡直是預先替現今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者說話了。但嚴復的智慧和忠實，使他不至如後世淺學妄人之所爲，拿一個空題目來大吹大擂，以迎逢思想界的惡勢力。

不過嚴先生對於中西文化的別擇是有具體的標準，並不是一個空題目。

同時他對於古今中外的一切，提出了一個選擇的標準。他認「今吾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將竭力盡氣，手繭足以求之。惟求之爲得，不暇問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新若故也。」所以凡足以致我國的愚、貧、弱的，「雖出於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將棄之。」反之，「雖出於夷狄禽獸，猶將師之。」因爲「神州之陸沈誠可哀，而四萬萬之淪胥甚可痛也！」^{〔五〕}這樣，爲了要挽救民族的危機，祇要在復興民族的大目標下，都得結成一個聯合戰線。這不就似現在一般人在高呼的聯合戰線論嗎？又嚴先生在當時，早已喊出各人應該放棄小己的自由，來謀國羣的自由，這豈不又似現在聯合戰線中的論調嗎？

在民國三年他發表了一篇民約平議，主要的意思是反對自由平等，反對取決多數的制度。同時他又主張專制。到了最近蔣廷黻先生在大公報的國慶特刊發表了一篇中國近代化的問題，他說：

無論在那一國，羣衆是守舊的，創造是少數人的事業。在辛亥年，如果全國對國體問題有個總投票的機會，民衆十之八九是要皇帝的。現在的民衆如有全權決定要不

要修汽車路，大多數會投票決定不要汽車路。數年之前，如蘇聯民衆能自由選擇集耕或分耕，百分之九十是要維持分耕的。

這不是嚴先生的反對取決多數、反對自由平等的鐵板注腳嗎？因此蔣廷黻先生對於近代化的結論，認為：

政權愈集中的國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績愈好。沒有大彼得的橫暴——不僅專制——，舊馬斯哥的守舊勢力是不能打倒的。戰後列寧和斯塔林的偉業實在就是大彼得的事業的繼進，共產黨在俄國的專制、恐怖、橫暴可說到極度了。以俄國民衆的愚蠢及昔日領袖階級的自私，非用極大的暴力，蘇聯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這不但贊成專制，就是再進一步的恐怖、橫暴，祇要在使國家近代化的大目標下都應該的。這比起嚴先生的主張專制是更進一步了。

以上所列舉的數種思想，它對於中國的爲禍爲福是另一問題。在這裏所要引述的，目的就在說明嚴先生的思想在中國占着一個多麼重要的位置，嚴先生的思想大部份總是跑在前面的。

嚴先生不但在上列的思想上是跑在前面，就是對於現實環境的懸斷也都比一般人跑在前面。在日俄之戰的時候，中國有棄海從陸的議論，主張專力陸軍而放棄海軍。他就非常嘆息說，要是真的棄海從陸，中國將終古爲雌伏而不能與人爭一旦之命。（見本書頁四八。）到了晚近的國恥史，不都證明了這話的真確嗎？

在同時，他對於中國的教育不注意於技術人材的造就，認爲此弊必見於十年以後（頁一一二。）這不是說明近代的中國，一方面在鬧着職業問題的恐慌，一方面需要技術人員還不得不乞靈於外國嗎？

在光緒二十五年西元一八九九年時，他已看到西方資本主義的繁榮不是真正的繁榮，他已看到生產過剩的病國，他已看到各國爭競市場的激烈了（頁二四一。）果然到了後來的歐戰爆發，再後來的世界不景氣，才把一般人信仰資本主義的迷夢打破，才認識生產過剩是一個怎樣嚴重的問題。

在民國三年歐戰開始爆發時，他說：

今之德皇，殆如往史之項羽，即勝鉅鹿，即燒咸陽，終之無救於垓下。德皇即殘比利

時，卽長驅入巴黎，恐終亦無補於危敗也。（學衡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五）他又說德國的不支，甚且或成內潰。這些話到後來不多證實了嗎？在當歐戰初起時，不但中國人大都認德國必勝，就是日本也是這樣，所以和德國締結密約。從這點看來，嚴先生料事的明斷也可知了。

再看他對於民國以後分崩離析的政局，認為軍閥的割據是無能爲，使有政黨出來爲一切之治，則中國還有所依賴。在又十二期第三十二裏他說：

夫國亂如此，北系經一番酣豢之後，既成暮氣而無能爲。（自注：彼輩當此之世，所統軍隊乃身家性命所託，而任其腐敗不可用。如彼浙江一閥，朱瑞卽無地容身。此曹尙不足稱強盜，直羊豕雞狗而已。）則使有政黨焉，以其魄力盤踞把持，出而爲一切之治，誅鋤異己，號令出於一門。人曰此暴民專制也，而吾則曰猶有賴焉。

這不是後來國民黨的掃除軍閥，成統一的一黨專政的先見嗎？

但他對於中國的一黨專政也並不樂觀，他又說：

假令一旦異己者亡，而彼族之中，又乖離分張，芽孽萌動，而爭雄長矣。

這不是有鐵的事實來證明嗎？

像這樣的先見，怪不得他的弟子熊純如要推爲至誠前知。他自己也說：

當一事初起，使僕稍諳其中情況，輒有以決其將來。卽如直皖之事，當上月之杪，僕謂段曹徐吳相爲仇敵，各爲名義固矣。惟是兩方士卒，皆幽冀齊豫之人，雙驅對壘，本非仇讎。而且以鄉里而同袍澤有年，他日交綏，必有反戈不戰者。其後果有十五師某團開轍向天之事，遂起衝突，而成內潰。則僕又不幸而言中也。（又二十期第七十）

不過他的懸斷有時也不準確的。譬如他晚年時觀察俄國的革命，認爲：

其黨所絕對把持者，破壞資產之家，與爲均貧而已。殘虐暴厲，報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讀。方之德卒入比，所爲又有過矣！試思如此豺狼，豈有終容於光天化日之下者耶？此如中國明季政竄而有闖獻，斯俄之專制末流而結此果，真兩間劫運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斷言。

那種懸斷的不準確，就爲他祇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宣傳，不曾看到蘇聯革命的真相。那末他的不能決其將來，自是必然的結果。

此外像他對於清廷僞立憲的認為足以召亡，對洪憲帝制的認為不可行，對復辟的斷爲無成，對黎元洪段祺瑞的執政認為不足以救中國的危亂，幾是每言必中。倘然他的話能够左右國人，能够見諸行事，那末中國的受福不是很大嗎？雖然他晚年的思想有許多不免陷於錯誤，但這種錯誤的來源，還不是因當時政治的極度紊亂所造成的嗎？他既有這樣的先見，所以常常慨嘆着國人的一定要「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因此所亡失的也就不可計數了。我們在事後追想他的話語，誠然不免於「嘆息痛恨於前人之所爲」，那末對於他留下來的話語，有許多還好像是針對現在而說的，那能不加注意呢？何況他的思想又是跑在前面，那末他的思想的有待於加以系統的敘述和檢討，似乎可以不發生問題了。

現在不妨再來略說敘述的體例。這種說明，對於讀者或許有一些幫助，並且可以解釋我對於剪裁和分期敘述的一點意見。

第一，在材料方面我是力求其完備和徵信。因爲要求完備，所以不免於繁；因爲要求徵信，所以對於嚴先生的文章不免多數節取。這也因爲嚴先生的文章在現在不容易找

得，要是不多數節取原文而僅加敘述，那末不足取信於人。同時又因我看到蔣竹莊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對於嚴先生思想的敘述僅僅節了一些天演論的譯文，不免使人感到太貧乏。所以我多節取原文，就想供給一般研究現代思想史的人，對於嚴先生的思想可以不必再務它求而資其挹取。同時又因嚴先生並不著書，他的思想都散在各雜文和翻譯的按語裏，要尋出它的體系，非費一番句稽的工夫不可。即就他的雜文說，或者是「論世變之亟」，或者是「原強」，在這些文章裏尋求他思想的體系，有時東見一鱗，西見一爪，也非加一番整齊排比的工夫不可。所以我這種多節原文的工作，就是對於一班藏有嚴先生文章的人也不無有些幫助的。何況嚴先生的文章，又因時代的關係而多數矛盾。不做一番整齊的工作，也很難了解他的矛盾的所以然。

第二我是想把嚴先生的實生活和思想打成一片。普通敘述思想家的思想，總是先約略數說他的生平，然後再講他的思想。把一個人的實生活和思想打成兩橛，讀起來往往看不出這兩者的有何聯繫。我現在企圖把這兩者打成一片，凡是足以影響他思想的實生活都羅列在前，也可以作產生他的思想的背境看。社會環境足以影響他的生活和

思想的，也連帶敘及。這樣從社會環境和他的實生活的變革裏可以看出他思想的變革來。

第三，凡是足以表現嚴先生人格方面的事情，我也不厭求詳地加以敘述。那因為中國人思想的特色就是偏重行爲，和西方人的偏重智識的稍有不同。所以中國儒家思想都是着重在小己的修養，從小己的修養擴充到社會的改革。這種精神和斯賓塞的羣學很相合。所以中國人對於思想價值的評判，認言行不符，爲世大詬。那末我們要看嚴先生思想的價值，自不得不着眼於足以表現他的人格的行事。何況嚴先生又是非常崇拜斯賓塞的羣學的，那我們對於這點當然更不應放鬆了。

第四，着眼於嚴先生的思想的轉變。普通敘述思想家的書，大都是把一家的思想從性質上去分類敘述。什麼是本體論，什麼是人生論，什麼是方法論等。這樣的敘述，往往忽略了一家思想因時蛻變的痕跡。不知一個人的思想，因着實生活的轉變和年齡的增加而時有流轉，也好比一時代的思想的流轉一樣。所以不着眼於轉變上去看思想，就不能解釋思想的有所矛盾了。

此外，除了自序外，對於篇中所稱引到的先輩，都用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例，「於平生所極崇拜之先輩，與夫極尊敬之師友，皆直書其名，不用別號。從質家言，冀省讀者腦力而已。」再者，對於王瑗仲先生的供給，我許多材料，使我得有所取資，實是很可感謝的。

末了使我記起了馮友蘭先生中國哲學史自序裏的幾句話。

此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荆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重思吾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爲何，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此精神之瀾漫，則善讀者可決而知也。「魂兮歸來哀江南，」是書能爲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

因爲這幾句話和我在寫這編時的環境和心境有些相同，所以就節了來做這篇序文的結束。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寫於滬上東洋花園後的寓處

註(一) 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註(二) 見申報最近之五十年中蔡元培五十年來之中國哲學

註(三) 見本編第三篇第二章三期思想的哲學體系

註(四) 天演論嚴復自序

註(五) 見本編中西文化折衷論「折衷於民族的復興」

嚴復思想述評目次

第一篇 全盤西化時期

第一章 教育環境的轉變

第二章 新思潮的影響

一 實證論

二 功利論

三 演化論

第三章 由軍界轉到思想界的經過

第四章 中西文化比較論

一 進化觀念的差異

二 政治思想的優劣

三 政治制度的優劣